

## 「中學師生民意研究習作計劃」研討會（一）

### 社會研究與中學生活

#### 計劃簡介及歡迎辭（主持黃德如）

黃德如：非常歡迎各位嘉賓、各位同學、各位老師蒞臨這次研討會，今天的活動名叫「中學師生民意研究習作計劃」，由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協辦，並獲得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資助。近年來民意調查越來越普及，社會上無論大小事情都會引起很多不同類型的民意調查，而傳媒在報導時也越來越多採用這些民意調查的數據，增加了民衆接觸民意調查的機會。可是，有些民意調查無論在方法、抽樣或統計方面都不合乎標準。在座有許多學生，你們在中學階段可能未必有機會接觸到民意調查，就我自己而言，也是要到了上大學才有機會了解民意調查是甚麼一回事。有見及此，香港大學民意調查中心特別與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聯合舉辦這項計劃，希望透過這項計劃，將民意調查介紹給中學的學生和老師。

這個計劃的對象是中四至中七的學生，暫時只是集中在十二間學校進行，分別是：一、張沛松紀念中學；二、香港真光書院；三、五旬節中學；四、德望學校；五、德愛中學；六、聖公會白翰會基督中學；七、聖傑靈女子中學；八、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九、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十、聖公會李炳中學；十一、九龍塘學校；十二、聖貞德中學。但是今天來臨的並不單是這十二所中學的同學，也有來自其他中學的同學，這是因為主辦機構希望有更多師生可以接觸民意調查這個課題。

今天我們很榮幸邀請了三位嘉賓主講，題目是「社會研究與中學生活」的題目。首先讓我介紹一下三位主講嘉賓，他們分別是來自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的呂大樂博士，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狄志遠先生，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高級統計師盧潔梅小姐。讓我們先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高級統計師盧潔梅小姐為我們主講，她的講題為「如何正確進行統計調查」。

現在將以下時間交給盧小姐。

#### 嘉賓盧潔梅女士講辭

盧潔梅女士：今天很榮幸得到邀請，我今天主要向大家講解在計劃或進行一個民意調查時有甚麼重點需要特別留意。我知道在座有幾位民意調查的專家，我似乎有點班門弄斧，稍後大家可以在答問時間再進行討論。

簡單來說，當要計劃或執行民意調查的時候，有五個主要步驟需要留意，現在我為大家逐一講解。第一個步驟是大家首先要坐下來想一想做民意調查的目的為何，是否要透過這個民意調查得到一些資料。中國古語有

云：「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在策劃的階段，大家常常會這樣想：既然花了許多人力物力、時間去做意見調查，不妨趁機會多獲取一些資料，所以我們往往發現意見調查內問題的範圍都很廣泛，根本不能突出主題。這樣，將來執行、搜集資料時要向被訪者解釋目的就顯得比較困難，而且影響了問卷的設計，最後對問卷調查的回應也有一定的負面影響，所以大家首先要清晰界定民意調查的目的是甚麼，目的要盡量簡單、明確，不要抱「漁翁撒網」的心態，問許多問題，希望十條問題中，八條有回應固然最好，否則，五條有回應也不錯。另外，要了解調查的對象，要訪問的是甚麼人，究竟是香港市民、學生，還是市民中的某一階層、某一種職業或年齡的人士。

釐定研究對象將直接影響抽樣與及抽樣的方法。有人會認為開始時將範圍擴至最大便能避免遺漏，是最保險的方法。譬如說要調查香港中學生對某件事情的看法，研究對象當然是全港的中學生。但假若未能找到全港的中學生，就隨便在全港市民裏抽一個樣本，到後來做資料搜集的過程時便會發現在樣本中有許多不合適的個案，因為裏面有很多（被訪者）根本不是中學生，這樣調查的整體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ness）便相應減低，從而影響了整個調查結果的可靠性。此外，在執行民意調查前要有詳盡的策劃工作，起碼要有足夠金錢和人力去完成整個統計調查，這點在規劃過程中需要多加留意。

第二個重要步驟是抽選樣本的方法。這其實很重要，因為整個民意調查／統計理論都建基於樣本是否有足夠的代表性，是否可以反映研究總體的情況。怎樣的樣本才有足夠的代表性呢？第一，抽樣的方法是怎樣？是否用合乎統計理論的科學方法去抽取樣本？一般來說，我們認為隨機抽樣、分層抽樣方法，以及整群的抽樣方法，都是一早已確立的統計學理論，是可以接受的抽樣方法。現在坊間一些團體進行的所謂抽樣調查，它所用的統計方法究竟是怎樣呢？大家可能都做過這類調查的受訪者，譬如在地下鐵站附近或街道旁有人走過來說：「小姐，耽誤你一兩分鐘，請你幫忙做一份統計調查，答一張問卷好嗎？」這一類抽樣調查往往被稱為「隨機抽樣方法」，但我想指出這絕不是隨機抽樣方法。為甚麼呢？因為這樣的抽樣方法取決於訪問者主觀的感覺而選取被訪者，他可能會因為某路人並非行色匆匆，拒絕接受訪問的機會比較少，或者某路人的面容比較和藹可親，不會斷言拒絕接受訪問而選擇他們做對象，導致在抽樣過程中完全沒有品質控制，結果抽取樣本完全取決於訪問者的主觀方法。這種抽樣方法在統計學上稱為「偶遇式抽樣方法」（haphazard sampling），就統計學而言，這絕對不會獲得一個富有代表性的樣本。

有些團體經常採用的方法是請被訪者打電話到熱線去表達意見。這類方法取決於被訪者本身的主動性，亦即樣本中並不包括那些不主動打電話去表達意見的人，而與訪問題目有直接關係，甚至有利益關係的人就會較願意主動發表意見，最後的調查結果難免有所偏差，往往只能代表部分人甚至比較極端的人的意見，而非全民的意見。以上兩種並非民意調查中抽



取樣本時應採納的方法。

要抽取具代表性的樣本，第二個要考慮的問題是究竟樣本要有多大才算足夠。雖然在統計學有很多公式（formula）可以幫助計算，但是並無定論。一般來說，樣本的大小取決於幾個因素：第一，要搜集的資料在要調查的人口中分散的程度。舉個例子，假設我想知道一班學生的平均高度，如果適逢班中每個學生都是五呎高，那麼我只要抽一個樣本去量度他的身高，便可準確地說出全班學生的身高都是五呎。可是，如果全班學生的身高有很大的分別，有些是四呎，有些是五呎，另一些是六呎的話，可以想像要準確量度全班學生的平均身高所需的樣本便要大一些，可能要起碼要選十個或八個學生來量度，才能比較準確地估算他們的平均身高。同樣道理，假若要調查的人口中對某事的意見比較一致，所需要抽取的樣本便可以少一點。相反，如果每個人所持的意見都不同，所需的樣本數目就可能比較多。一般來說，假如調查是針對全港市民，我們會建議最少抽取五百至六百個市民做樣本；如果樣本少於五百至六百，結果的誤差可能會是超過5%，甚至是10-20%，數據便不夠可靠，不可以被廣泛地採用。

有一點我希望大家可以多留意，許多人在抽選樣本前做很多準備功夫，有很好的設計，有很強的理論支持，還準確計算出樣本該有多大，然後去抽取樣本。後來拿名單一看，發現當中包括了狄志遠先生，於是心想：「他是名人，還是不要把他包括在內比較好，萬一得罪了他，他向傳媒投訴就情況不妙了，把他從名單裏刪除了吧！」但我們很反對這種做法，當你抽選了樣本後就不應該隨便更換。

做民意調查第三個很重要的步驟是問卷設計，如果是事實資料，如某間公司營業額是多少，那麼問卷設計的重要性可能會減低，但民意調查的問卷設計非常重要，特別是問題所用的字眼，因為題目所用字眼不恰當，譬如含有一些引導性字眼或一些壓力性字眼，就會引導被訪者偏向回答某一個答案。曾經有人問以下的問題：難道你認為政府不應干預非法擺賣活動嗎？題目簡單，但理解方面很困難，所用字眼例如：難道、不認為，讓受訪者第一眼的感覺有很大壓迫感，假如答案是政府不應該的話，好像很大逆不道，違背大部分人的意願。可以預料受訪者就算有強烈的個人意見，亦傾向於一些為社會所接受的答案。又例如有些題目用的字眼不夠清楚，以下面這條問題為例：「你上星期有否見過輔導主任？」這句話給予人的感覺是：見過是甚麼意思？是指見面傾談，汲取意見，還是指見過面打過招呼呢？其實這條問題只是想知道究竟學生有沒有見過輔導主任，接受對方輔導，那為甚麼不直接問「你上星期有沒有接受過輔導主任的輔導」呢？所以「見過」這字眼就不適合用在這問題上。此外，有些比較敏感的問題也需要留意。例如有人曾經開門見山直接問被訪者「你有否嘗試在超級市場高賣？」這問題問得太直接，除非訪問者對被訪者充滿信心地認為被訪者會忠實回答這問題，否則被訪者以前無論因為甚麼理由曾經高賣，也不會承認。這些比較經典的例子，將來大家為民意調查撰寫題目時，要小心避免類似情況。

另外，有些問卷問題表面看來沒甚麼，但其實有很大問題。舉一個大家經常見到的例子：「你認為香港的政治經濟前景如何，看好或看淡？」看似恰當的問題，因為沒有敏感、引導及壓迫性字眼。究竟問題出在那裏呢？問題出在太複雜，因為這條問題其實是兩條問題，因為一個人對於某一地方的政治前景及經濟前景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可能是看好政治，看差經濟都說不定，那麼怎樣答好呢？當答案是看好，你不知道指的是政治還是經濟，所以要儘量避免用這種複合性問題。所謂複合性問題即一條問題裏包含多於一條的問題。

設計問卷後就是資料搜集，也是整個調查的重點，因為沒有原始資料，就不可能編制出一些數據。在搜集資料過程中，有很多地方要預先想清楚，例如究竟用甚麼方法去搜集資料 - 是採用郵寄問卷，待被訪者填完後寄回，還是採用電話問卷，或上門做訪問呢？當然每一種方法也有它的好處及壞處。如果問卷裏的題材淺易，任何人也可容易理解，而問卷也設計得容易填寫，當然可考慮郵寄問卷。但如果問卷題材比較艱深，而問題不是一般市民可以掌握到的，例如是關於施政報告或某一類政綱的問題，就不適宜郵寄問卷了。這是因為訪問員也許需要向受訪者解釋一些背景資料，好讓對方比較容易發表意見，在此情況下，電話訪問或面談方式會比較合適一點。但電話訪問也要注意一些地方，例如問卷不可太長，因為一般城市人 - 特別是香港人 - 比較性急，做電話訪問超過十五分鐘後，受訪者多數不耐煩，往後的答案便會敷衍了事。電話訪問的另一困難是受訪者很難核實訪問員之身份。被訪者要對訪問員有足夠的信心，確信訪問員是代表某一機構進行某一個調查，才會提供資料。如果問卷內容涉及一些個人私隱或比較敏感的資料，也許電話訪問的回應率會較低。所以要因應問卷題材、被訪者是否能夠很方便提供資料等因素來決定究竟採用哪一種資料搜集方法。

在資料搜集的過程中，我們當然鼓勵訪問員事前接受足夠的訓練，如訪問員對調查目的、問卷內容一概不知，只懂拿著問卷照讀，照記錄，我相信他們搜集回來的資料的質素會有影響，因為當被訪者對問題有疑問時，訪問員都不能解釋清楚。

另外，回應率也很重要，怎樣才能確保整個資料搜集過程中能夠得到高回應率呢？先說甚麼是回應率吧。譬如你的樣本有五百人，最終成功訪問多少人，再計算百分率，這個百分率便是回應率。據知很多團體所做之調查，回應率大概只有10%至20%，我們覺得回應率這樣低的統計調查所得出的結果偏差很大。舉一個例子，某次調查的回應率只有30%，結果是大部分人都贊成某一件事情，如事後訪問者很努力跟進剩下的70%樣本，結果可以是相反的，真實情況可能是大部分人都反對這事情。由此可見回應率對於整個統計調查結果的可靠性是有重大影響的。現在政府統計處所進行的調查，回應率全部達到90%以上。當然這和統計處是政府機構不無關係。第二，大部分搜集資料應是可根查之數據，被訪者可從以往記錄中尋找資料。現在於意見調查方面比較有經驗的團體，一般來說其意見調查的回應

率都達到60%至70%，這類統計調查結果的可信性相對比較高。舉個誇張例子，抽一萬個樣本，但最終只能成功訪問到二百多個樣本，即回應率不足10%，這類統計調查的可信性便使人質疑。

做完資料搜集後，最後兩個步驟當然是如何處理這些資料，而整合之後就可編制成統計數據，然後發表數據。在整合資料前，應該細心再看一遍每張問卷所記錄之資料，看看問題與答案會不會有些不吻合的地方，又或覺得有疑問之處。如有，就需要適當地做出跟進，譬如找受訪者澄清等，然後才正式進行編制統計數據的工作。

發表統計數字的過程其實也很重要，在報章見到有關某某團體所做的某某統計調查的報導，結果是「……」，其實這並不足夠。對於廣大市民來說，你只是在發表一些數字。當然數字本身很有意思，但市民覺得單憑數字，是無從判斷究竟值得投多少信任票的，最終應該相信還是不相信呢？所以當大家發佈一些統計數據的時候，無論是用新聞稿形式還是統計調查報告形式，標準做法是大家應該將統計調查方法一併發放給用家，當用家知道統計調查方法後，讓他們自己判斷調查方法是否合乎科學原則，有否理論根據，而在資料搜集過程中，曾否有出現偏差，導致統計結果也有偏差。

#### （主持黃德如）

黃德如：聽過盧女士講解調查方法技巧後，我感覺獲益良多，原來在抽取樣本（sample）後，便儘量不能更改，所以如同學聽完今日的研討會後要做民意調查，訪問時突然聽到一把像董建華的聲音，而你又正在做董建華民望調查，你應照樣問「董建華應否連任」。

現在請第二位主講嘉賓呂大樂博士繼續講解民意調查的困惑和解讀，有請呂博士上台。

#### 嘉賓呂大樂博士的講辭

呂大樂博士：各位早。我很高興有機會參加今天這個研討會。我會集中講兩個論點。當我獲邀出席這個研討會後，馬上想到兩件事。第一，我曾在有中學生參與的研究計劃比賽中擔任評判，很多時候，我強烈地感受到，很多基本要點，譬如剛才盧女士所講的，大家很難在一個早上全部領悟，所以我建議大家回家再想想剛才說過的基本要點，因為從我擔任某個計劃的評判十年以來，每年都不斷發理有同學犯上這些基本要點。例如某些同學的問卷設計得很好，還會做幾百個街頭訪問；某些則覺得上一屆只有幾百份不夠多，下一屆做一千份，再將問卷送檢，用大堆頭政策，希望拿到獎項。這種做法通常不會有好結果，因為訪問者為爭取更多樣本而在街頭胡亂找樣本，然後你會發覺通常都是男同學找年青女士做訪問，女同學經常找年青男士作答，但這樣搜集得來的資料並沒有用。這是我第一感覺。

第二個感覺就是在答應出席研討會後，我往往發現星期天常有大量民



意調查發表。今天早上我做了一個很簡單的調查，在星期天和星期一，至少有三至四個民意調查結果公佈，報導篇幅通常都很驚人。但我一直有個強烈的感覺，要是你認真去看內容的分析及報導，不知為何，我總不太明白其中的內容，既使看上三四遍也不明所以。我很怕看這些調查報告，如果大家有機會做的話，希望大家能避免重複這些錯誤。

我要講的一共有四點。第一，我想提醒同學想清楚，究竟所做的問題是否真的需要民意調查，因為有很多事情常常是我們需要發掘，或很想去探究其問題，但這些事情其實並不需要做民調。舉個簡單的例子：大學裏的同學一般都對大學食堂有意見，都覺得那裏提供的食物很恐怖，理由很簡單，當你每天都在食堂吃飯，終有一天你會發覺分不清自己吃的是咕嚕肉還是咕嚕魚，連魚和豬肉也分不清，因為食物永遠都是同一種味道，所以大家都很痛恨這食堂。痛恨時有兩種想法；去問同學對具體食物的意見，但很多人不喜歡做這工作，只想告訴人食堂的食物不好吃。所以一年前，有某一本年青人週刊做了一個所謂的意見調查，我覺得很震撼，請大家不要學。該週刊找人拖著一頭豬，到七間院校的食堂吃飯，看看究竟豬不肯吃哪一間食堂的飯。不幸地，那頭豬拒絕在本人工作的大學的食堂進食。究竟是豬吃得太飽還是有其他不明的原因呢？那篇文章裏說豬吃餓水，連豬都不肯吃，証明食堂飯菜質素太惡劣。如果你想說某些東西不好吃，可以不用做民意調查。如果一定要做民意調查，應該問同學對飯堂服務或膳食服務的意見是甚麼，而不是問東西好不好吃，這樣問的話，每人口味不同，味覺就更見仁見智，後來也可很容易打圓場說我們不可能要求每一個餐廳的食物都好吃。所以如果你覺得不好吃的話就是不好吃，不需要做民調。問衛生、整體設備、價錢等方面，才需要做民意調查。

舉另一類例子，上星期有關於粗口歌的調查，因為大家都知道某隊樂隊深受歡迎。但有時我們又會做一些問卷調查，問一些普通人，究竟他們認為這些粗口歌是否會鼓勵或鼓吹以另類方法發洩不滿情緒。其實類似問題，我覺得可去訪問心理學家或有關輔導專家，問他們覺得粗口是怎樣。如果訪問市民大眾，問他們是否覺得唱粗口歌會是鼓勵用另一種方法去發洩一些不滿情緒，而這途徑是不正當的途徑，這就變成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況且，你可能發覺這問題不是意見，相反，這問題已深入至究竟他們認為怎樣才是更合理的處理情緒方法。第一樣你可能要問究竟自己是否正在做民意調查呢？你想發掘的東西跟民意的關係是甚麼呢？你可能會問同學對某樣東西的評價，這些可能是民意調查做得到的工作，但某一類題目，你應問專家意見，因為有時考察可能比民意調查更適合。你要清楚自己在做甚麼，訪問的對象是否能提供所需資料。不要把一般市民都當成是專家，讓他們去分析究竟唱粗口歌是否正確，對一個人健康成長有沒有正面影響。

第二點剛才盧女士也提過，就是做調查時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在香港，其中一種是郵寄問卷調查，這是一個成本高昂的遊戲，因為郵費貴，通常不採用。另一類是要被訪者自己填問卷。在座同學可能都會嘗試這樣

做。好像在教育學院讀書的老師，在課室發問卷給同學填，如問卷設計得好便沒有問題，可以滿足你的要求。但根據我的經驗，自填的問卷，如設計得不好，或者處理得不好的話，會出現很多古靈精怪的問題，結果出現了over-reporting。例如問題是由中一開始有多少個異性朋友，被訪者會有兩類反應，一類反應是覺得尷尬，不知怎樣回答，既使有也不作答。另類情況是，我以前讀男校，大家很高興一齊討論怎樣填，大家都誇大，看見隔壁的同學填幾百，自己就填一千，反正不會有甚麼後果，誰也不認輸，愈多愈好；其實後果十分嚴重，因為這樣的資料根本沒用。即使很正規的研究也會遇上這類問題。舉例來說，成年人性生活的問題，你會發覺得到的答案不知如何分析，不知是被訪者太怕羞、太誇張；是心裏認為可以是這樣，還是真的可以這樣 - 這些都是很麻煩的事情。有些人用開放式（open-ended）方法，待被訪者填上詳盡的資料。每個星期或每個月，我所教的大學都有一些類似月會的東西，希望同學給意見，問卷預留空位給大家寫意見，究竟大家認為演講是否精彩，希望包括甚麼題目等。每次收回的一千幾百份問卷，通常會提及飯堂的飯很難吃，校巴服務太差，要爭取更多校巴，但從來沒有人提及講者究竟如何，甚至有些只講院長很英俊等完全沒有關係的東西，結果你會發現很難處理這些資料。

面對面訪問當然有它的好處，或者將來你有機會做小規模研究時，可以考慮這種方法，它可能比（剛才盧女士也提過的）電話訪問好得多。電話訪問現在很機械式。我最近有這樣的經驗，一拿起電話就聽到「我是某某市場調查公司，請不要中斷我們的電話訪問」，於是我立刻把電話筒擱下。這樣很影響成功率。我最近還做了另一份問卷，（我很少做問卷，但因為我是做社會研究的，所以也要支持同行），那份問卷大概包括四至九種電子產品，訪問員不斷要求我從九樣產品中選出最喜歡或最有機會買的便答「1」，最少機會買的便答「9」，如是者講了大概十五分鐘，我根本不知他說甚麼，所以我說全部都答「9」。如果後面換過來說「9」代表喜歡買，「1」代表不喜歡買，這個訪問就錯漏百出，毫無意思了。所以我想提出無論郵寄，派發問卷，直接訪問還是電話訪問都各有長短，各種方法都有其壞處和好處，你要考慮甚麼方法適合你的計劃，或適合自己，而且不會產生你認為的不良後果。

第三，當我們研究社會現象時，假如想了解的現象並不能從表面知道，便需要找一些指標。舉個簡單例子，有些人有興趣研究粗口歌對青少年的影響。其實如果真的想研究，無謂做問卷，應該做實驗。在學校找一班同學不斷聽粗口歌，另一班不准聽，一星期之後看看有聽歌的這班人的行為有甚麼不同之處。曾有問卷問到究竟你認為粗口歌對你有甚麼影響，你叫別人怎樣回答呢？被問的人會想想自己沒聽過這樂隊之前是怎樣，聽完之後又變成怎樣，可是他們也不能直接回答影響是什麼，因為那是更深層的東西。另一例子是一個關於照顧家庭壓力的研究。這個調查不是做得不好，而是不知道它用的那個方式而搜的資料可以怎樣理解。這個調查發現有兩個很有趣的現象，一個現象是原來有兩至三成家長在管教子女所花時間的問題上填上零小時，換句話說，即完全不花時間管教子女。在輔導

功課上，有四成家長不會用任何時間去輔導子女的功課。結論是「這樣的家長，疏忽子女管教，……」跟住又問家長管教子女時有否感覺很大壓力，答案是九成人感到很大壓力。到底這可以怎樣理解？究竟是因為那些不用時間在子女身上的人很想用時間，但奈何無時間，所以覺得慚愧，心理壓力很大，還是因為他們覺得沒有能力，希望得到援手，所以心理壓力很大呢？或是他們覺得應該用很多時間去管教子女，所以心理壓力很大呢？我看完報告後還是不太明白。當然我現在這樣說對他們很不公平，如果我拿到調查報告，也許不是這樣，但看報紙的時候，看了半天也不明白，究竟那二至三成，甚至四成人不花時間在子女身上的數據，是代表這些人疏忽管教子女，還是他們認為自己是開明的家長，所以不想用這種方法管束子女，因為如果答七小時以上（因統計是這樣分類），你就變成是過份管教子女的人。你怎樣答也不好。再者，老實說，我不相信有人會用零小時，假如你早上起床，父親想用洗手間，而你正在用，他必定會用起碼一分鐘來教訓你了，整個月下來，應該都有一小時以上。零小時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究竟零該怎樣去理解呢？如果答案是零小時，又是甚麼意思呢？所以要想一想，你取到的資料，究竟能否直接告訴你想得到的答案？或許那些資料取回來後你也不知這群用零小時管教子女的人算是有問題還是沒問題，是他們不喜歡做這事情還是有心無力？如果你問完這問題之後，你還需要加其他附帶問題，再作探討，然後才可找到你需要的東西，這樣你需要認真想想，一來可能浪費資源，問卷雖然弄得很長，結果仍是沒有用；二來可能會因為問得不準確，而不知怎樣寫報告。

此外，你要考慮何謂趨勢。現在我們看調查報告很流行用「越來越……」等字眼。以前並沒有粗口歌，現在出現後，我們很容易察覺年青人越來越「粗口」了，但這是否是事實呢？不知道。因為十年前我們並無測試年青人有沒有講粗口，他們可能比現在更「粗口」，只是用的句子不同罷了。十年前，可能「乜你咁削架」這句話已經是粗口，現在經過廣告播出後，我們會覺得只是用字不對，是修辭上的問題，甚至是維他修辭問題，而不是粗口問題。在總結一個所謂趨勢時，你需要很小心，因為很多人在自己完全沒有過去資料的情況下硬要說趨勢。我不是因為主辦當局和鍾庭耀有關係而讚美他們，只是起碼他們會花一段很長的時間，用同一類調查方法研究同一類問題，才作出趨勢分析。當然你可能覺得，研究歷史的人，一動手就要十年、二十年；只是說幾年時間，趨勢都不可能基於短期波幅而作太多評論。我們市面上見到的民意調查，其實做調查的人根本不知道五年前的情況，也不知道三年前的情況，但因為見到有某現象出現就會講某些趨勢。我在一九九七年前，大概在九四、九五年間，曾經接到一個有名氣記者（不是黃德如）的電話訪問，他說當時香港社會出現一個名叫周星馳的人，鼓勵一些叫「無厘頭」文化，他覺得這事與九七是有關係的，所以問「社會會否隨著九七越來越接近而變得越來越『無厘頭』呢？」當時我的答案是「不會吧」。如果認為這是對的話，到九七大家便無話可說了。「無厘頭」的定義是大家不知講甚麼也繼續講，假若它與九七有關係，即越接近九七，「無厘頭」程度就越高；到了九七年七月一號就到達顛峰期，所以應該沒人知道大家要說甚麼。我想人類應該有些基本



共識，既使到了九七也不會變成「無厘頭」吧！但他明顯很不高興，想我說一句話，就是社會越來越「無厘頭」。我不肯。那記者說：「不如倒過來說，『無厘頭』受九七影響，越接近九七『無厘頭風』越來越熾熱，行了吧？」我還是不肯評論。他掛斷了電話後，從此的關係越來越惡劣了。這些所謂「越來越……」和「趨勢」的東西，將來你們寫報告的時候，要想清楚是否真有這樣的事情。有人做研究的時候會複製（replicate）人家的東西，意思是人家做過的研究，你選擇重複再做，目的是要看看這次的結果有沒有改變，成不成為一個趨勢。做調查的人此時就要分辨出調查是否真的能顯示出那個趨勢或變化。

最後要談談詮釋（interpretation）的問題。我們搜集得來的資料往往和我們的理解是有分歧（gap）的，好像剛才說的「家長用零小時去管教子女」，我們便要詮釋（interpret）這個現象背後的意思。舉例說明，好像調查報告在星期天的報章上往往佔有很大篇幅，那些悍匪好像在星期六休息似的，讓大部分政黨能在星期六乘機發表言論。一個簡單的調查詢問老師關於學生的違規行為，這是很奇怪的，為甚麼不直接問學生而去訪問老師呢？這也不打緊，老師也可以作出判斷。結論是小學中有兩成被訪者認為小學裏有暴力行為，中學大概只有一成。換言之，小學生比中學生暴力。當然在記者輔助訪問裏也証實了這個結論，因為他訪問了一個在這區附近的小學生，他承認在校園裏無故跟人打起架來，究竟打鬥是基於碰撞發生，還是放學後蓄意尋仇呢？這卻無從考究。總結統計資料證明小學生在某些方面比中學生更暴力。第一，可能問卷設計和定義很不清楚，以致產生這些小問題，即剛才盧女士所說「你有否見過訓導主任」那類問題。見過代表甚麼？我時常也碰見他，問題是見面也不代表有對話。所以有時字眼不清楚是一個問題。譬如問你有沒有見過校園有暴力行為。老實說，我也相信小學生可以很暴力，有些推撞一類。不久前我到兒子的學校取成績表，有些同學正在玩鞭鞭，先垂直推，後來向橫推，有人被撞倒之後，跟住有幾個人發生口角。這也可算是暴力行為，但你怎樣理解這個數字？如小學生比中學生暴力，那該怎麼辦呢？又例如粗口歌，一個很有趣的統計數字顯示有一半以上的人聽過粗口歌，其中超過一半的人認為應該限制不可公開播放，無聽過的大概有六成多認為不可公開播放。該怎樣理解這些數據呢？我的理解是聽粗口歌的人與不聽粗口歌的人都認為不適合公開播放，所以其實聽粗口歌的人也可以相當理智。但這只是我針對數字去分析，當然可以有另一角度。

有超過12%無聽過粗口歌的人認為不應該播放。這百分比高於聽過粗口歌的人。是否証明聽過粗口歌的人不負責任，漠視社會秩序？有四成多聽過粗口歌的人認為可以公開播放，所以是否無聽過粗口歌的人才是良好青年呢？詮釋（interpretation）是你自己加上去的理解，這些理解大家要小心，因就統計而言，往往我們要做一些變項（variable）控制，甚至要看究竟兩個相關因素是否有關係。為甚麼我們要做一些統計的分析？其實是想知道究竟我們的理解，會不會有科學根據，所以同學不用花全部時間去做fieldwork。我特別提醒大家，不要以為做得多就一定得到好結果，這

是錯的。剛才說，如果抽樣做得好的話，你不需要每一個傳媒都做過也可以有一個很好的研究計劃。反而你可多放點時間去設計問卷、籌備你的計劃。放多點時間、精神去理解一下收回來的資料，究竟自己這樣理解這些資料，是否合理，其他同學會不會有不同意見，大家要用較為科學方法去消化資料。這消化過程可能比想像中更加重要。因為往往成為報告書裏最有價值的部分，就是分析及討論部分。

謝謝各位！

**（主持黃德如）**

黃德如：謝謝呂大樂博士，現在可做一下資料補充，剛才呂博士說九四、九五年時，其實我不是記者，我是他的學生。他提到為甚麼星期天、星期一的報紙特別多調查統計。我曾經做記者，有些經驗。那時一些政黨非常希望有更多傳媒報導他們的消息，所以一到星期六、天新聞比較少的时候，他們就想出很多調查出來，但我那時最怕星期六、天當值，因為去採訪政黨調查，譬如某親中政黨，就會做一些國旗罐頭，我想：「唉！我又要去超級市場了！」接著某一個民主黨調查又跟風，去做公廁乾不乾淨的調查，我就知道我要去公廁了。所以看來大家以後做民意調查的時候，應該考慮一下究竟題目是否值得去做。接著我們有請第三位嘉賓狄志遠先生主講民意研究對學生學習的意義，有請狄志遠先生。

**嘉賓狄志遠先生的講辭**

狄志遠先生：謝謝主持。兩位講者、各位同學，大家好！今天我們談民意調查，我認為應該身體力行，大家既聽亦做，所以我要進行一個民意調查，希望大家幫忙，我這個民意調查題目是「青年人心目中最受歡迎男歌星是哪一位？」經過細心分析，我挑選了三位準候選人，第一位是謝霆鋒，第二位是陳奕迅，第三位是張學友，我們將會透過科學化方法去瞭解青年人心目中最受歡迎男歌星是哪一位。調查方法很簡單，我讀出他們的名字，大家舉手表示你認為哪位最受歡迎便可。大家認為謝霆鋒是最受歡迎的請舉手，請不用害羞，我很科學，只有一位呀！糟了！仍有兩位。好了，認為陳奕迅最受歡迎的請舉手，1、2、3、4……我知道了。張學友請舉手，1、2、3、4……謝謝各位！我看到研究最受歡迎的應該是陳奕迅，第二是張學友，第三是謝霆鋒。謝霆鋒及王菲一定很傷心！跟住我要問的問題是，三位男歌星當中誰最英俊，你認為謝霆鋒最英俊請舉手，1、2、3、4……知道！陳奕迅的請舉手，1、2、3、4……不是嗎？你們真的認為他英俊？張學友英俊？啊！他也有四位同情分。我知道謝霆鋒最英俊，其他兩位不作評論，因距離太遠了。第三講歌藝問題，三位歌星那位歌藝最好呢？張學友請舉手，好了一面倒，我們毋須再做下去了。這調查很科學，因為大家一起參與，同時亦很認真地參與。在座都是來自全香港不同學校的學生，樣本都做得很好，我設計的問題也很認真和清楚，很容易作答。

我作了幾個結論，第一，是我作為陳奕迅經理人，我認為全香港最受歡迎的歌星，包括男、女都是陳奕迅，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他和買他的唱片。第二，如果我是買美容廣告，我就覺得這調查告訴我，謝霆鋒是最英俊，為甚麼？因他用了我的產品，所以他越來越英俊。第三，是歌藝，我是戲劇學的老師，我曾經教過張學友半堂，他的歌藝好我也有貢獻。最後，呂大樂做個結論，香港青年人太膚淺了，因為他們選的最受歡迎歌星都基於英俊和「無厘頭」 - 因為陳奕迅既沒基礎又不英俊，歌藝又不好，但他卻是最受歡迎的。年青人實在太膚淺，這麼簡單都不懂選擇。他們很可悲，大學教育實在太失敗了，應該增加多些資源讓我們的大學做得更好。謝謝大家參加這個調查研究。

我不是教大家怎樣做調查，因為剛才已經有兩個專家談過了，作為喜歡看調查研究的人，我會談談我怎樣看調查研究，和我會怎樣理解民調對學生學習的貢獻。但我想講一句心底話，現在香港進行的所謂民意調查，基本上是個笑話。就算大學進行的又是否理想呢？不錯質素會比較好，但我覺得還不夠理想。其他商業機構、民間團體，甚至有些服務機構做的調查，基本上都是笑話。所以大家看民意調查的時候，和看周星馳的電影相比，也不無一定的娛樂性。無論如何，調查員想有他的本質，有他的意義，我自己覺得調查研究是幫助我們認識或了解一些社會現象。舉個關於時事的例子，近期發表財政預算案，於是有許多圍繞財政預算案的調查，問市民是否歡迎這個預算案，或大家對這預算案滿意不滿意。甚至有人問，「你給財政預算案多少分呢？」有些時事問題，可透過調查研究去了解市民是怎樣看調查的問題。除了時事問題跟我們日常生活可能有關之外，還可以從一些現象，看到社會未來發展。近期一個重要熱門話題，是賭波應否合法化。政黨及團體馬上問，你贊成不贊成合法化？……有七成贊成……這些都是透過一些民意調查，希望探索將來的發展路向。有些民意調查和我們的生活閒情及情趣很有關係。正如剛才我們提到的笑話百出的最受歡迎男歌星選舉，現在市面上都有類似有關生活情趣的民意調查。

民意調查很多元化，最主要的目的是看到一些社會現象，看到一些人的想法。如果一些數據或資料能反映某些人的看法或某些現象，我覺得還是有一定幫助，最低限度是有一個系統的方法去處理一些資料。譬如七成的人滿意財政預算案，八成人支持陳奕迅，這些數據都是一些現象，雖然不能完全反映社會現象。但對我們教學可能有一定幫助。有甚麼幫助呢？正如我說，提出一些數據，這些數據值得我們去討論，也有不同演繹方法。我不知道你們學校有沒有這樣的事。我讀大學時，老師最喜歡複印報紙作討論。正如呂大樂說，星期六、天一定很多這樣的調查報告發表，然後老師將同學分開五至六組，跟著大家討論一下。這些數據其實是一個好話題，因為研究機構很聰明，它會找些大家很關心的問題，大家不關心的問題它不會找，例如：究竟董建華喜歡吃早餐還是午餐，這問題大家都沒有興趣，所以不會做研究；但董建華支持率有多少，大家都很感興趣，因此大家都去做。所以調查研究有個好處是帶來一些大家關心的話題，也搜集了一些數據。所以我們不要在此停下來，應該拿數據去和學生討論、分



析，大家各持不同的角度，我覺得所謂的教學意義就是提供了一些好的數據和好的話題。

第二方面，我常常看見學生在辯論比賽中這樣說：「我們根據中文大學呂大樂博士所做的研究得悉，七成中學生喜歡陳奕迅，所以陳奕迅應該是最受歡迎的。」學校辯論時很喜歡引用這類資料，所以大家在日常談話、討論或是嚴肅的辯論中，都會引用這些資料，作為學習上的交流。這對大家造成衝擊，好過大家憑空講，變成過於常識（common sense）。但有這些數據，大家於辯論裏，就可以有不同演譯，增加說服力。除了在課堂討論，或者一些嚴肅的討論（譬如辯論比賽運用）之外，有時學校舉辦展覽，像昨天我女兒學校的開放日，我看見有民意調查出現在報告裏 - 某學會引用了一些民意調查，使展覽會更充實，更有說服力。我覺得這些資料在教學過程中可以以不同形式被引用。其實對學生來說，引用他人的民調有甚麼意義呢？好像在座學生都將進行一個民意調查，這是很好的學習過程。於整個過程中，你會取得很多資料，想到很多問題，並要理解這些問題，和進行討論。這個過程是一個很好的學習過程，無論在你對問題的認識，對同學之間互相學習，和怎樣面對社會，面對公眾，面對群體等方面，都有很大幫助。

第二個好處是可以學習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不同的東西。剛才呂大樂講得很清楚，對同一個數據，不同人可以有不同的演譯。剛才我做的那個歌星調查，不同人有不同的演譯，於是學生在過程中，或是看調查報告時，可以學習從不同角度看同一個問題。第三，透過民意調查可訓練學生的批判能力。我覺得這很重要。香港沒有空間、沒有機會讓學生去鍛鍊、培養批判能力。我希望可以透過討論民意調查帮助大家培養判斷能力。我認為民意調查帶來的貢獻是幫助學生去認識這個社會，從不同角度看問題，建立大家的判斷能力。民意調查基本上強調了科學和理性，但我想提醒各位同學，這個社會看問題不應只有理性角度，也應該有感性感度，所以我們不應只用理性角度看社會問題，其實這個社會可以從感性角度看問題。究竟新來港移民及人士有沒有資格成為香港居民呢？如果開放這一百六十幾萬人，香港怎麼辦呢？於是很多研究告訴我，香港市民似乎不想一下子有太多新移民到香港來跟我們爭飯碗，令我們教育、醫療等福利都出現很多問題，這是理性的分析。但我們也要看看，其實新移民當中也有很多家庭問題、個人問題。試想想，爸爸在香港，媽媽和子女在國內，他們的生活及家庭會有甚麼問題呢？又或者姊姊已到了香港，弟弟尚在國內，那麼照顧弟弟方面又有甚麼問題呢？社會上有很多理性角度之餘，亦有感性的一面，而大部分研究和民意調查只是表達了理性的一面，但這個可能太簡單了。我希望大家可以從多一個角度來看民意調查。

民意調查基本上是一個笑話，很多人嘗試將一個簡單問題複雜化，大家想像一下，一個複雜的問題，例如究竟我們是否支持董建華連任，該用甚麼方法來找出真相呢？於是我們購買一副電腦，買一套電話系統，輸入資料，它便會自動每個晚上打電話去不同家庭做訪問。一星期後有數據出

來，結果是有九成市民支持董建華繼續連任。究竟這樣複雜的社會現象，是否透過這些機器，透過這樣的程序，就能找到結論呢？我很懷疑，但民調往往就是用這種方法。另一個問題，有講者說為甚麼星期天、星期一這麼多民意調查的報導呢？許多人很聰明，懂得找尋空間，因為他們知道那空間可以有機會登出他的報導，但究竟我們的民意調查是爭取出現在報章裏面，還是反映社會現象，帶來社會進步？其實許多做調查的人的動機，都是希望宣揚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政黨想宣揚他們的政綱，政府想宣揚他的施政，商業人士想宣揚他的產品，就算學術界人仕，都希望宣揚他們學校的認受性，甚至是知名度。如果在這樣膚淺的基礎之下做研究，究竟可靠性有多高呢？所以我非常質疑現在的調查，無論是它的調查方法，動機和最後的演繹，我都覺得基本上是個笑話。既然是個笑話，學生就應該多作出批判，多從不同角度看問題。我希望這個過程能成為大家一個很好的學習空間和學習機會，謝謝大家！

#### （主持黃德如）

黃德如：謝謝狄志遠先生為我們說民意調查的意義。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大感受，很多民意調查都很無聊，小妹不知不幸還是有幸，在某些網上投票獲選某某機構之花。但其實我很想告訴記者，我不是第一，我沒拿過第一，第一其實不是我。但他們不會理會。還有，現在的傳媒喜歡在人名之前加上綽號，於是甚麼某某機構之花就跟我一世。最慘和最可惜的是我已離職，或者我年紀已開始大，以後我發現報章報導我的某某機構之花時有個「前」字，即代表過氣。報紙或傳媒所引用的調查，有些是網上調查，如果我有影迷（fans）的話，大家可以多幫忙，上網多按（click）幾下我便可上升至第一位。希望大家再見到民意調查時，不要再輕易相信表面的東西。不耽誤大家時間，現在有十五分鐘休息時間，然後大家可以向三位講者發問，待會見。

#### 休息時間

#### 嘉賓討論及台下發言

（問）：剛才三位講者都說民意調查要有意義和要有趣（interesting），但是他們並無具體說明何謂有意義和有趣（interesting）。

呂大樂博士：我想我不會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每個研究計劃的考慮點會有所不同。我想舉一個例子。本人是消委會舉辦的一個消費文化研究計劃的評審，去年有一個頗出色的研究計劃，由中學生（不大高年班）策劃，題目當然是針對消費文化。其實很多學生會做許多奇異創新研究計劃，這個計劃就蠻有意義。他做的是校內同學的意見調查和消費行為調查，題目是研究校內同學在大埔區內選擇理髮店有甚麼因素（包括價錢、款式等），然後問一些關於理髮的消費行為的問題。我在評審的時候非常喜歡這份報告書，原因有兩個。第一，他能夠避免選擇一些範圍太廣泛，一般同學根本不能控制的題目。第二，他的題目並無脫離生活。其實很多題目也很有趣，如董建華的民望，但是很少能像這份報告般反映同學的生

活感受。而報告收集的資料也令人覺得對實際生活有一定影響。我相信他的報告後來也會在學校展覽。他的同學於是可反省、了解其他同學是基於哪些因素選擇理髮店。從我的角度看，在配合主題方面，這個計劃也算蠻有趣。因為有趣的東西不一定是社會普羅大眾認為有意義的東西，相反，題目如能令人在生活中產生共鳴，也可以是很有意義的題材。

狄志遠先生：剛才有同學問有趣和有意義的問題，如調查既有意義又有趣便最理想，但我覺得現在坊間的調查很有趣，但大部分都不太有意義。如大家想到又有趣又有意義的調查便好了。我怎樣理解有意義的題目呢？第一，這個題目是否很多人關心？別人一看到題目，是否有興趣去了解一下？第二，是否真正可反映一些現象？有些現象其實不用調查也可知道，譬如最受歡迎男歌星是否陳奕迅？大家都知道，不用調查。第三，可否對整個社會帶來正面影響？如果有這一層更加理想，舉例我們委員會早前做了一個關於家長如何看性教育這個問題。這個題目其實很重要，我看到的有兩點。第一，家長很倚賴學校進行性教育，他們希望學校做，認為不應該由自己做。第二，為什麼他不希望自己做？因為他們自己也不懂，在他們自己成長的過程中，也沒有接受過性教育。他所認識的性教育，也是一知半解，根本沒信心、沒能力去教他們的子女，於是依賴學校。這些研究比較有用，它讓我們知道問題所在，我們可以針對問題做很多功夫。

黃德如：謝謝狄志遠先生，我想請問盧女士，其實政府統計處在做統計時是否常常在有意義和有趣方面有所保留呢？

盧潔梅女士：我想正如剛才呂博士說，任何一個統計調查究竟是否有趣都取決於使用數據的人或研究目的。我相信任何統計調查都一定有一小撮人覺得有趣和有意義才會進行。我想舉一個例子：很多看似很細微的東西其實也可以是很有趣和很有意義的。昨晚我下班乘坐巴士回家時，聽到有兩個大概十四至十五歲的女孩子在交談，其中一個對她的朋友說：「我從來都不會跟媽媽去逛公司買衣服，跟她一齊去，沒有一次可以買到，她穿的衣服『娘』得很。」她的朋友對她說：「你指導一下你媽媽吧！」女孩子說：「我不明白，人家的母親又是母親，我的母親又是母親，我不明白我媽媽為什麼『咁娘』呢？」這番話使到我想這可能是一個很簡單有趣而又有意義的民意調查的題材。我們可以試問一下年青人去買東西或買衣服時，他們會選擇些什麼款式，或用什麼來衡量、決定買不買那件衣服呢？當家長看到結果的時候，他們可反省一下，為什麼我以前會迫子女買這些或買那些呢？這對於拉近父母和子女的距離有很正面的作用。再宏觀一點看，對維繫整個社會的安寧及和諧氣氛，也有很正面的作用，所以其實那件東西究竟是否有趣和有意義，主要是看你怎樣運用數據，以及你的心態是怎樣的了。

黃德如：謝謝盧女士。我也可以補充一下。如問青少年穿衣服其實不用問款式，你只須問她們喜歡那一位歌星，如容祖兒、陳慧琳就可以了。其他兩位講者，不知有什麼可以補充呢？



簡翠京女士：我在中學教書，平日較為接近中學生，他們做報告（project）時會牽涉搜集資料。除教書外，我也在圖書館工作，發現學生在搜集資料時常常牽涉到一些民意調查。我很同意狄先生所講，所謂民意調查其實都是很大的笑話。我們經常看見學生在圖書館設計問卷。時下年青人做什麼也沒計劃，一想到報告（project）題目就是問卷的題目，跟著就隨意寫問題。我知道在座的同學將會做一個關於中學生的問卷調查，可能會先訂一個題目，然後才設計問卷。在問卷設計方面，本人也是外行，所以我很高興鍾先生提議這計劃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因為自己身為老師也不太懂得如何指導學生設計問卷。我覺得設計一份好的問卷很困難，但收集的資料是意思的，可供分析的。我覺得這就是一個起點。中學其實是否需要有一科或在某些科目裏面滲透下去，讓老師先裝備好自己，然後再去教育學生呢？日後教育改革裏也強調「學會學習」，我想學會學習裏面最重要是搜集資料；在搜集資料當中，又會牽涉一些調查，這環節很重要。現在有大好的機會，有十二間學校參加這個計劃，首先恭喜你們有機會入選，做一間在民意調查方面的先導中學。你們比別人走快了一步。很多學校老師也不懂得設計問卷，這方面我想老師不是完全不懂，但如果他們很有理論性、很有條理地去教你們設計一份好的問卷，真的是相當困難。而且現在坊間很多傳媒經常透過民意調查介紹資訊，一般市民往往都信以為真，墮入這個陷阱。如果我們很容易便信以為真，沒有一個批判去釐定民意調查做得好或不好，我們對整體社會的批判力便減弱了，甚或被引導，變成帶東去東，帶西去西。我覺得這很危險。或者我沒有回應問題，但在這裏我想說的是，我很高興有十二間學校被選中為先導中學，我也希望鍾先生日後完成這個報告（project）之後，可向教署反映，是否可以在某些學科裏面滲透這個元素，或者讓老師有受訓的機會。

黃德如：謝謝簡女士。其實不單老師要學，我覺得最急切要學的是政黨，讓他們再做民意調查時會有更好的水準。鍾博士有什麼補充？

鍾庭耀博士：簡老師提到我們的習作計劃。我想說今天參與的可能只是十二間學校，但我們很希望能將今天各講者、嘉賓給予的寶貴意見集成小冊子；換言之，我們先做一個先導計劃，留下一些小冊子，將大家意見記錄下來，然後分派給其他沒參與是次講座的學校 - 這也是我們發起這次活動的其中一個目標。回應剛才台下提出的問題，我可提供一些意見給大家參考。首先是意義問題，意義是一個很重的包袱。不同人在社會有不同的角色，不同活動有不同的意義。我想從一個很實際角度看，做社會研究或民意調查，最後都牽涉資源的運用。今天大家也是在用自己的時間資源參與活動。如果我們要做一個非常專業的調查，當中涉及的人力和財力資源會相當大。我們的問題是為何要用這麼多資源呢？當然，如果是一間私人公司做一個調查，它有錢，喜歡問一個「八卦」問題，那是它的問題。譬如我自己在民意調查的工作方面，要有三種意義我才肯去做。一種是大眾都很關心的問題。當然大眾可能很關心陳奕迅的問題，那我們應該去做，大眾可能很關心賭波是否合法化，我們也應該去做。無論大眾關心什麼東

西，都有其意義。當然未必一定有意義，但起碼在社會學角度來講，如果真是普羅大眾都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它可能已經變成社會文化一部份，那麼我們應該提供一些數據。

第二方面，如果有些民意數據對一些政策，尤其是政府政策，能夠提供一些參考作用的話，它就有一個政策上的意義，或是一個策略性意義。這類調查往往已經有政府、壓力團體或其他機構在做，這又是另一種很重要的意義。第三，在學術圈子裏，即大學工作的同事，當然也會考慮研究某一種學術意義在哪裏，有些學術研究在當今日社會是完全沒有用，但可能某一種看法，某一種理論，加上其他人的努力，最終會變為一種新的看法。而這種新的看法，新的理論，可能會影響社會也不一定。依我看，如果一個調查能夠符合以上三種意義之一，我覺得已經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調查。但有意義當然可能完全沒趣味。怎樣才算有趣，我不太清楚。一般我們所想有趣的調查，可能是一些報紙上的「八卦」題目。我想大家跟著可能要草擬十二個題目，或是一些平時的習作，那個框架不需要太大意義，因為這始終只是一個學習過程。趣味是學習的一個很大的原動力，所以你想衣著的問題也好，老師美不美的問題也好，只要你覺得能夠引起同學的興趣，或者你有興趣做，我覺得都無所謂。但如果從一個社會整體關注來看，一些「八卦」的調查，我的看法是也許娛樂版要做，它覺得有市場便做，我不會否定它的意義。但我最不喜歡見到的就是「八卦」調查等於不嚴謹的調查；就算我有一條很有趣的題目，如剛才說哪個歌星最英俊，但做的調查可能是隨便在門口找二三十人做訪問，明天當然會成為一個很有趣的報導。但這有趣的報導並不能告訴讀者其實它是用一個不科學的，但很有趣的方法做出來。我覺得做法嚴謹很重要，題材反而是次要。題材隨著不同的人而有不同的意義，但我覺得調查不用太嚴肅，尤其是外國調查雖然很專業，但一樣有很多很生活化的問題。民意調查很平常，社會有這樣的資源和興趣便可以進行，但方法要認真。所以我反而覺得有趣有時是難求的，有時很難要求每一個調查都要有意義才做，而且意義有時很深層，未必馬上能見到。但最重要的是不論什麼調查也好，如果稱得上調查，尤其是民意調查，一定要嚴謹地做，和嚴謹地公佈它是怎樣做。

黃德如：謝謝鍾博士。請問台下有沒有既有趣又嚴謹的問題？

同學：各位嘉賓好，現在很多報導的民意調查只用一些簡單圖表和數據表達，而且往往在報導之後就對這些問題下一個結論，甚至態度。我們將來會做民意研習的習作，我想問我們應該對我們研究了的問題下一個結論，還是該作一番客觀陳述，讓看的人或閱讀的人自己思考呢？謝謝！

黃德如：不如由呂大樂博士先說。

呂大樂博士：我想剛才你問的問題很重要，因為它反映了我相信很多中學同學，甚至是大學同學在做研究時所忽略的一個情況。其實我們做一個研究前，會花一些精神去做一些所謂文獻的回顧。第一，社會上有多少人

做過類似的研究。第二，如果沒有人做過，那麼有些什麼研究或討論正在進行。第三，初步建立一些假設（hypothesis），意思是我們不單是想做一個很簡單的、所謂facts finding的研究，如果我們只是要知道究竟我們校內有多少人隨地丟垃圾，那麼派張問卷問有多少人是這樣做就可以了。我們常覺得做這些行為的人，一定是良好教育水平的人，如果不是他們怎麼會隨地丟垃圾呢！如你相信這樣的說法，便要收集他是高班還是低班的數據。如果你假設男生通常會這樣做，你就要去問被訪者是男還是女。可能你覺得背景資料裏的性別、年齡等一定要問，但其實不是。我們做問卷前要想一下要解釋些什麼，我們相信背後有什麼因素可能和我們的解釋有關。所以在你正式做一個調查之前，你需要花一些精神和時間，根據你自己的假設先去做一次數據或資料整理，看看能不能找到和自己的假設相關的東西。這些假設會引導你將資料分類，正如剛才說的例子。譬如某人對環保的支持程度，可否從性別、年級、讀文科或理科，和他另一些社會態度，即所謂交叉分類，看一下是否有一個模式（pattern）。所以我建議同學不要只想隨便問一些東西、找一些資料回來，然後告訴用家那些資料是什麼就當作是完成了。

你在計劃過程裏其實已經做了一些假設，無論搜集回來的資料證明你做的假設是對還是不對也不要緊。若假設是錯的，或是暫時沒有任何証據可証實這個假設的方向是對的話，也可以拿來討論，因為起碼這個假設的出現表示社會裏有些人確實是這麼想。譬如剛才就有人就粗口歌調查做了一個交叉分析。很明顯他假設沒有聽過粗口歌的人應該更加不贊成這些歌在公開地方播放，怎料原來聽粗口歌的人的支持率也很高。他可能也不能解釋，但也要面對這情況。所以你們在籌備階段應多用些時間在設定假設上。

黃德如：謝謝呂大樂博士。其他講者有什麼補充嗎？我們請盧小姐講講。

盧潔梅女士：其實我很認同呂博士所講，在做調查統計之前，無論是什麼形式，是一個意見調查又好，是搜集一些比較實在的數據也好，你要很清楚你的目的是什麼。一個統計調查或意見調查只是一個工具，幫助你去搜集你需要的客觀資料，以支持你的論點，或是反證你的一些假設（hypothesis）。所以其實在你設計統計調查的過程中，需要考慮什麼樣的資料才能夠達到你的目的。剛才那位同學問，傳媒在報導統計調查結果的時候，究竟他應該怎樣做呢？我覺得這就要視乎你的角色了。譬如你想做一個研究，那當然需要一些資料去支持你的研究。所以你做一個調查，取得資料，然後拿著資料做很多分析，最後下一個判斷，一個結論，以解讀那些數字。當然你不會只報告你的統計調查怎樣做，得到的結果是怎樣就完畢。你一定會再加上你自己的看法、結論等。舉例來說，統計處的角色其實是希望幫助政府，幫助香港市民，透過用統計調查這個方法，去搜集各方面的資料，然後給不同的用家使用。政府是用家之一，因為在制定政策時，它需要一些資料支持。經濟分析也可以是用家，他們可能會拿著數據去分析香港經濟狀況如何。用家也包括做社會研究的人士，他們也會



拿著數據做社會分析。在此情況下，統計處的角色就真是單純做統計調查。所以我們一般只會完成統計調查，然後出一本報告，用很中肯、客觀或者中立的態度報導統計調查的方法和結果。當然結果不是純粹數字，也會有些分析，但這些分析都是比較客觀的，完成分析後不會再落判斷和結論。至於傳媒工作者，我認為他們應該清楚自己的身份，究竟是純粹報導新聞，還是製造新聞。當然這個取捨很視乎傳媒工作者自己，以及傳媒機構本身所訂下來的方針。

黃德如：謝謝盧女士，呂大樂博士有補充。

呂大樂博士：我有兩點簡單補充，剛才盧女士的話提醒了我，有一些東西可以介紹給同學，就是統計處有很多報告可以協助我們發掘資料，他們有 general household survey，定期會編製一些特別報告（special report），內容包括不同專題，如「甚麼人願意捐贈器官」、「吸煙人士」或「境外工作人士」，這些報告未必全部都適合同學參考，但是某些部分也頗為有用，可以讓大家知道某些社會現象已經有大規模的數據存在。直至現在統計處已出版了二十多本這類特別報告，每本包含兩至三個專題。這些二手資料可供你們作參考之用。另外，我雖然不是評審，但我經常閱讀這些資料。剛才我強調事前準備工夫，我是認真的。同學如果不加思索便開始，往往導致事倍功半。假如你多做事前準備工夫，就算只是在飯堂閒聊，事後可能證實有用。

第二點是總結部分，我常常收到很多報告，不論來自中學生或大學生，我很怕看到那些類似某類我並不鼓勵的、類似新聞報導的手法。像剛才的例子，小學生有暴力事件的報告在結尾時訪問了一些中小學生，他們被問及在學校有否同學打鬥，他們說有，於是做報告的人就妄下結論，說『校園暴力事件問題嚴重，值得正視』，這些結論永遠都是對的。另外，同學寫報告時往往說『基於人們對這個現象有許多不同觀點，因此我們必須對這個問題作進一步探討。』那麼這些報告到底告訴我們甚麼呢？報告需要有假設，同時也需要有結論。這裏再舉另一個印象深刻的例子。有一次我備課時，看了一套香港電台在十多年前拍攝的青少年專輯，看完之後，發現事隔十多年後電視正播放著相同題目的專輯，兩輯結尾時都捕捉了尖東海傍一些青年人的背影，旁白是『這些青年人面對這樣的前途，究竟將來他們會變成怎樣呢？』我看過兩輯節目之後，感覺很不好，他們十二年前和十二年後意說著相同的說話，都不對這些青少年的前途下判話。這完全是對的，因為報告本身不應有任何價值判斷。可是做調查研究的人往往有一種野心。剛才鍾庭耀先生說得對，如果有些東西對其他人來說無甚重大意義，但對你來說是有意義的便不妨將之肯定，甚至寫下來。但這些結論一定要有科學根據、有基礎的。結論部分要有詮釋（interpretation）的成份，千萬不要太過四平八穩，因而忽略了自己有證據支持的觀點。」

黃德如：謝謝呂大樂博士。他的意見我非常有同感。我做記者的年代，有

所謂美其名的平衡報導，即是當你訪問一個反面意見時要加插一個正面的意見，我在想有正面又有反面，豈不說了等於白說？其他講者還有補充嗎？

盧潔梅女士：我不是發表意見，而是想問問題。剛才呂博士說有機構或部門已經做了許多民意調查，譬如說中學生的閱讀興趣調查，許多機構都有做，我自己也會做，可是既然那麼多人會去做，像統計處的可信性甚高，又有龐大人力物力，我們還有需要去做嗎？他們其實也緊貼潮流，在不同階段也有跟進。要知道做民意調查要動用龐大人力物力，要是我看到類似的調查，是否就可以放棄不做？還是應考慮不同人做的調查也有偏差，而繼續進行自己的調查呢？

狄志遠先生：假如在同一個題目已經有具說服力的研究存在，我認為你便毋須再做。因為那已經有參考價值，反而你可想想有沒有較深入的地方可以跟進。

黃德如：我個人認為學生的閱讀興趣這個題目假若由官方老師來做便沒有真實答案，反而由同學來做可能更有價值。

鍾庭耀博士：我想提出一個觀點。如果我們把一個專業調查視作知識的累積，往後才想成本效益的話，假設現在我們有一個完整而美滿的「中學生閱讀習慣」的研究報告，報告發表後，是否已解決了我們關注的問題呢？作為一個學者，我覺得是已經足夠了。如果是足夠的話，問題便已經得到答案。但世事往往是不完美的，既使用了許多資源去做研究，從知識累積角度來看，也會有很多其他問題引伸出來。譬如事隔半年後事情會否有新的發展？所以即使以前有一個很好的研究，也有必要再作一個新的跟進研究。

又譬如在外國可能已經有很好的研究，裏面的理論非常清晰，但是當實踐於現實環境時又會否有所不同呢？這些問題要不斷地跟進。當然，統計處或政府其他部門動用龐大資源去做的研究很專業，可是他們在選題方面還是有未盡完善的地方，有些題目也不方便由政府去策劃研究，可能要其他私人機構、學術機構去補足，只要大家都遵守專業守則，我不發覺在香港有嚴重資源重疊的情形。相反，不專業的調查比比皆是。這是因為大家的出發點並不是知識的累積，而是一種造勢的工具，更破壞了研究本身的理念和專業精神。

黃德如：謝謝鍾博士，我也同意你的意見。譬如剛才說青少年閱讀習慣，如果是書展前後，由送「刀刀劍劍」的書展商做出來的話，可能結果又有不同，不知在座的同學還有沒有問題？

老師：各位嘉賓，你們好，今天聽了多位講者對民意調查或調查意見的看法，我也說說我的看法。調查其實有很多種，民意調查是其中一種。今天

討論的焦點好像不是只集中在民意調查裏，而是一般調查，可能是學術調查、市場調查等。民意調查最重要的作用是嘗試去量化一些難以捉摸的民意，變成一些具體、可以掌握的東西。其實這可能有別於一般學術的研究，尤其是在香港社會上很多的民意調查的目的，不單只是反映民意，最重要的是，正如鍾博士剛才說，是嘗試去影響民意，多於反映民意。其實我們是否要去告訴同學民意調查和一般調查的分別和做法上的不同呢？另外我們可能還要討論民意本身的特質，比如多變性。受訪者今天發表今天的看法，支持董建華連任，明天可能因其他事件而有變化。還有同學調查時的動機、操守（ethics）等問題，我覺得都要注意。不知各位嘉賓有何意見。

黃德如：不如我們請鍾博士講講！

鍾庭耀博士：我試試說，但我想其他嘉賓可能比我更清楚，要解答這個問題，真的很複雜。各位老師已經很清楚香港的民意調查裏有很多問題容易被忽視。或者我先從外國經驗去看。在外國或者是一個比較民主開放的社會，一般的民意調查，即所謂我們時常見報的民意調查是怎樣的呢？它們通常是由一些network或傳媒本身，根據專業標準提供很多民意數據。當然，就算是甚有公信力的調查機構，也會有一些批評。我的意思是在外國，調查機構有沒有政治背景呢？是否有動機呢？這個我們可以懷疑，但起碼在外國，很有公信力的傳媒，比較容易過這關，因為它有專業守則，而且很多調查是定期進行的。可是說到香港，我猜台上所有嘉賓也會很同意我的講法，香港傳媒質素遠遠及不上這水平。無論是傳媒自己所做的調查，還是他們報導的調查，其實都是在當講故事者。故事要看有沒有讀者市場，議題是否吸引，反而調查的方法並不重要。在香港，很多調查應該不能稱之為民意調查，劣質的民意數據只是常常被「擺上檯」而已，這個情況我想同學們、市民們要小心注意。

剛才提到民意調查的性質。我覺得值得說說，其實外國有很多大學在做民意或社會輿論研究，北京人民大學也有。我們應將輿論研究放在什麼位置呢？它常被歸納在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裏。有些人認為它屬於一個社會研究（social research）或實務社會研究的課題。也就是說，在調查方法方面，它其實和一般學術研究（即社會的調查研究）分別不大，不過問題焦點集中，意見和態度有同一個價值，而且有很多理論的互相結合。事實上，在香港以外，這半年來經常被談及為什麼香港沒有人討論「鏢旋的沈默，沈默的鏢旋」這一個理論。這個理論其實已經出現了很久。社會民意的發展其實是一個理論，需要很多學術界的朋友來探討，然後應用在香港。但我們發現香港學術界很少在這些課題做文章。大家見到的民意調查都很片面，或報章只選擇了其中一些部分去報導。我們需要覺醒，尤其是學生，須知道香港現在的民意調查絕對有不足的地方，而最大問題是我們沒有一個專業的標準。外國有專業的監察，香港沒有，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坦白說，作為行內人，我打開報紙，每天也有很多數據，可是我完全不予理會，看見民意調查也只是笑笑便算。即是學術界做的調



查，或是我認為信得過的調查，我也只會看大概，因為如果我沒有讀報告，是不會相信報紙上所說的東西。我以前比較相信某些報紙，但這幾年我發現，即使是我最相信的報紙，在報導方面也有錯誤。我不知道有什麼方法能夠改善這種情況，可能今天的活動是其中一個方法。

黃德如：謝謝鍾博士。我的方法是不去看。

狄志遠先生：我想鍾庭耀博士已經講過我們應怎樣看市面上的調查報導，我也有幾點想補充一下。有些研究大家可能沒有機會看，因為在學院做的很多學術性研究，是不會高姿態地透過報紙「賣」出來。在報紙「賣」的研究很多是有動機的，而為了造勢，傳媒常常（剛才我所說）將複雜問題簡單化，因為這樣報導簡單容易，例如七成青少年有自殺傾向，便個很震撼和很簡單的說法。傳媒往往找到這些答案便算。但是我們也要反省一下，為什麼傳媒會做這些題目呢？傳媒需要考慮市場因素。為什麼市場存在這些空間呢？為什麼有人喜歡看這些東西呢？我覺得這個現象與我們整個文化質素很有關係。大概香港市民喜歡小報路線的東西，喜歡看這些嘩眾取寵的資訊，所以就有市場，於是傳媒就因應市場需要做這個題目給大家看。我覺得你不可以單說政黨的質素不夠，或者報紙失德，不夠專業。事實是市民大眾都想看這樣東西，所以他們就做這些東西給我們看。今天剛好我們有這個報告（project）。在這報告（project）裏，我們當然樂見你們可做一個有趣、有意義的題目，向我們反映社會現象，但如果在過程中，令到你的質素提升，或你影響到你同學，令他們的質素也有所提高，將來這些嘩眾取寵的報導消失於市場上，那麼這個社會便是進步。我們不要只批評傳媒的報導，我覺得這是社會現象，市民大眾就是喜愛看這樣東西，七成青年人喜歡自殺，是很容易理解的說法。但你說青年人情緒有很多問題，原因是家庭等等……這雖然是一個很完整的研究報告，但只會放在香港大學的圖書館裏，而沒有人會去看的！

黃德如：謝謝狄志遠先生。在場朋友還有什麼問題嗎？

同學：請問可否讓我們三位同學一齊發問？

黃德如：沒問題！

同學：我想談談以前在圖書館的職務，就是要做一個類似民意調查的調查，問同學對圖書館整年的表現有什麼意見。那份問卷的設計其實很有問題，其中有一條問題是問同學為什麼不去圖書館，而老師提供了二十多項選擇給同學，同學們在讀問卷時感到很複雜。同時，有趣的是，我們問同學對哪類書籍有興趣，大部分同學都選擇科幻或懸疑類小說，但根據借書記錄，最多人借的圖書，竟然是聖經、麥嘜（McMug）春田花花和會考試題書，所以我們覺得數據搜集回來後也不知怎樣用，非常矛盾。就算是簡單的問卷題，如只是同意不同意，給五個數字你選擇，5是同意，1是不同意，我們學生也會做過，但同學們只是很敷衍地回答，例如全部選擇3，或

選擇5等。全校千多份問卷，可能有好幾百份都是這樣。我們覺得這樣浪費了我們的精神，雖然我們很認真地想問題，但同學們卻不認真地作答。請問怎樣才可防止這種情況出現呢？

同學：人口普查的長問卷有四十幾條問題，請問它的設計是否有問題？

同學：我想問有關篩選調查員的問題。其實調查員的道德操守也很重要，例如問卷會不會是自己填了便算——這對調查報告的可信性有很大的影響。我想問各位有什麼方法可監察這種情況？

黃德如：謝謝三位同學。我先將他們的問題分開，我想問第一位發問的同學，你的老師在座嗎？不在是嗎？在？不在才是真的。如果老師在座的話都敢這樣勇敢發問問題，我會很佩服，要稱讚這位同學。我請簡小姐回答第一條問題，因你是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的代表。

簡翠京女士：我首先想問同學，你們設定問題的時候，往往有一些變數。例如：多人借閱的會考試題，並不等於學生喜愛看的，其次漫畫類如「春田花花」較受低年班同學歡迎，這取決於問卷的樣本分佈於那個年齡組別，其實單是這樣問的話，我是很難回答。

黃德如：謝謝簡小姐，不過我可補充第一條問題，怎樣防止亂填問卷。我可告訴大家，大學裏面也是亂填問卷的。譬如呂大樂教完書後，學期尾他就會派一份所謂評核，即你覺得呂大樂教得好不好，我們同學會說呂大樂好，其他我們不甚喜歡的講師，我們也會胡亂選擇。就這個問題，呂大樂有什麼補充？

呂大樂博士：同學問到究竟怎樣解釋我們做完的一些調查，或是為什麼在搜集資料之後，到我們利用資料去處理實際事務時會出現矛盾。這裏包括了很大的可能性。純粹從最抽象角度來講，就是態度和行為很多時有差距。有很多事情我們認為應該做，或以為我們有做，可能實際上來說，你是永遠也不會做的。簡單的說，如有問卷問大家是否應該根據紅綠燈的安全指示過馬路，大家一定覺得應該，但你會不會這樣過馬路，又是另一回事。所以第一個可能性在這層面發生。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我們做調查的時候，因為要令調查本身可說服人，或令人覺得合理，你可能會這樣想：既然是調查關於圖書館使用的情況，當然是要問全校的同學，因為全校同學都有權用這個圖書館。但是，很多人也知道在全校同學中，其實只有一部分人才去圖書館，大部分人是會不去圖書館的。原因有各種各樣，可能是他不喜歡看書，也可能是他家裡很多書，所以不需要去圖書館，又或者他的家長很鼓勵他買書，所以很多書他已擁有。各種原因令到你訪問的對象並不是你需要的人。（當然，這是關乎抽樣上和設計上的問題。）另一些我們在現實中見到的調查，為什麼這個傳媒機構要做欣賞指數調查，那個傳媒機構要做收視調查呢？原因

是多人欣賞的節目並不等於多人收看，所以某些傳媒機構就設立一個欣賞指數調查，以衡量節目的可觀性。

第三種情況，如你派問卷問某人用圖書館的功能，他會想像自己會做什麼，但其實自己可能會做的東西，往往和自己做出來的不同。例如問我喜歡看什麼書？我會說喜歡社會學書，但我記得中學時代去圖書館，可能是因為剛才午餐時見到一個女孩是同一所中學的，所以我會去圖書館找校刊看。基於以上幾種情況，調查所取得的資料對我並沒幫助。所以在設計問卷時，有時得要在設計上及選取對象方面想方法，令結果是我們得到我們想問的對象才最重要。

至於另一個問題是關於怎樣保持質素，我相信統計處的朋友及鍾博士一定可以回答得到。大部分嚴謹的調查都會再核對一次問卷，也會再問被訪者有沒有人來訪問，訪問了多少時間，甚至將部分問題再問一次，以確定訪問之質素，所以調查員是否有道德有操守，其實很容易給人發覺。

黃德如：政府統計處的盧女士是否有所補充？因為剛才的問題是問人口普查問卷有四十多條題目，這份問卷有沒有問題？

盧潔梅女士：我想補充一下關於訪問員道德標準問題。正如呂博士說，任何比較嚴謹的統計調查，我們也不會隨便派發問卷給受訪者，讓他們自己填完交回後，然後我們利用他們的答案作資料統計。我們中間必定要經過一個核實的過程，核實的過程其實有很多所謂的核實法則（validation rules），我們會將每一條問題的答案仔細查看，因為題目與題目之間，應該會有一定的吻合性（consistency）。在這過程中，我們已過濾過了一些問題。當受訪者填問卷的時候，問題主要是因為不小心或在很匆忙的情況下而錯填答案，故我們會再找受訪者核實問題。另外我們會再抽一個樣本，（剛才呂博士也有提及），然後找另外一些人，重新核實問卷的答案，以確定訪問員是否真的有去做過類似的工作。其實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搜集資料，自填問卷只是其中一個方法。一般來說，我們都盡量避免只用一張自填問卷。的而且確，自填問卷很倚賴被訪者抱著什麼心態來填問卷。他是否抱著一個很嚴肅的心態去填呢？這樣是很影響質素的。很多時就算只是寄自填問卷予受訪者填，我們也不會只是叫他寄回來便可。相反，我們一般都會再派訪問員上門去收問卷，在過程中會做一個簡單核實工作，看看他是否亂填問卷。發現有問題時，便會即場更正。這個方法即將應用於二零零一年的普查，全香港有七份六的住戶都要做一張短問卷。短問卷即自填問卷，我們事先寄給市民，請市民預先填妥，到時有訪問員上門收回，在回收的過程會有做核實的功夫。

除此以外，我們另有一些具體的措施去保證訪問員操守的問題。除了監管的方法外，其中一樣是曉以大義。我相信任何一個團體都會做，即會跟訪問員講清楚職責，如作假問卷，後果是什麼——輕則是個人誠信有問題，重則其實整體影響了調查結果，因為有關結果會被廣泛應用，特別是



政府根據有關結果來訂定一些政策。如果我們訂了一些不適當之政策，結果可能害了全香港的市民。另外，就統計處統計調查的訪問員來說，香港其實有法例規管著我們的行為。我不知大家知道否，任何一個訪問員，如果不誠實去作問卷，又或根本沒有去過，回來說有去過，但找不到被訪者，這些缺乏誠信的行為，是有機會被控告的；這屬於刑事罪行，他是需要坐牢的。所以我們從各種不同方法去保證數據之素質。

再回答第二條題目。有關二零零一年之普查問卷，確實是有四十幾條問題，但我相信大家都會理解，因人口普查十年才做一次，而每一次花費之人力物力非常龐大，所以我們一定會盡量透過人口普查去搜集我們認為需要之資料。其實訂定問卷是很痛苦的過程，一方面我們既想搜集多些資料，另一方面要因應市民在提供資料方面的負擔，我們不想大家在看見問卷時因為覺得很厭煩而不想作答。所以其實我們中間都經過很漫長的諮詢工作，其間廣泛諮詢了不同階層，然後才決定問卷的內容。大家不要被四十幾條問題嚇怕，到時我們會有訪問員上門替市民填問卷。而且事前我們做了一個頗大規模的測試，測試樣本比坊間任何一個所謂正統的統計調查還要大。在這測試中，我們嘗試測試市民對於提供有關資料所遇到的困難，結果他們平均用二十分鍾就可以將這麼長的問卷填完，所以在這方面大家不用太擔心。

黃德如：多謝盧小姐。請問在場同學和老師還有沒有問題？

同學：剛才我聽到三位學者說到設計問卷的事前準備功夫很重要，但如果收回來的問卷有變數，而這並不關乎訪查員的素質問題，相反可能是受訪者的態度不好，那我們該怎麼辦？收回來的問卷又應該怎樣處理？盧潔梅女士提過不能隨意更改受訪資料，遇到這種情況我們該怎麼辦？

黃德如：不如請呂大樂博士先說。

呂大樂博士：我估計你面對這情況有幾個可能性：一是訪問只做到一半而受訪者拒絕繼續作答，因為你的問卷太長，又或問及一些最敏感問題，例如「你校內女老師用哪種鯊魚丸？」受訪者中途拒絕作答表示問卷有幾種可能性，有些人的做法是，如果最基本、最重要資料都齊備，只是有少量未作答，他照樣採用。但有些人覺得沒有作答完整份問卷，問卷就不能採用。亦有很多問卷給訪問員寫一些筆記，判斷究竟訪問過程有什麼問題會影響問卷的質素，然後讓做訪問的人考慮是否採用有問題的問卷。就如我做過一次人口普查，被訪者的答案在邏輯上根本不成立。經過跟上級討論後，決定不予採用那次訪問。而有些訪問亦有讓訪問員記錄被訪者的態度作為參考。此外，在設計問卷時我們亦要考慮到問題會否引導被訪者不認真地作答，以致資料的可信性減低。

盧潔梅女士：我補充一下，在執行統計調查的過程中，的而且確會發生很多預先不能估計的問題，所以我們鼓吹早於計劃階段，便要預計將來可能

發生的問題，然後盡量在計劃實行前先解決這些問題。例如我預計到我要問的問題很敏感，絕大部分人不會作答，在這情況下，你可能要退一步想想，我其實是否適宜做一個統計調查。又例如我預計回應率不會很高，因為比較難找到肯作答的人，在這情況下，你應想想是否不應選擇這時段做訪問，相反，選擇在夜間的時段做訪問會否比較好呢？舉例來說，有些團體想問一些人現時是否失業，或正在就業，他選擇打電話到住戶訪問，而所有電話都是在日間打的，你可預計正在就業的人，日間便不會在家接受訪問。所以一方面統計調查的回應率很低，另一方面他找到可於日間接受訪問的人，大部分都可能沒有工作，所以統計調查結果是很多人都失業。其實這很視乎你的計劃是否周詳，因為當你開始執行時，其實已經太遲，無從補救了。我們經常接到一些個案，就是統計調查差不多完成了，但只得兩成回應率，有什麼方法去補救？我們通常都說沒法補救的了，只有當沒有做過，從新再做。

另外，大家在做統計調查的時候，對社會週遭氣氛及環境是要有一個敏感度的。我舉另一例子，不知大家還記得年多前，有團體做了一個調查，問青年人最嚮往做什麼職業嗎？當我們未看調查結果時，大家都會估計一下，香港是一個比較功利的社會，大家一定想做醫生、律師、工程師等專業工作，因為這些工作可能較為穩定，而且收入也高。怎知出來的結果很令人詫異，原來絕大部分香港青年人的志願是做消防員，而他們最看不起的職業是傳媒工作。為什麼呢？原來那陣子很多電影和電視劇的題材都是關於消防員的，內容當然說消防員的工作很偉大，捨身救人。而且消防員的角色都由偶像派演員扮演，所以大家看完電影或電視劇後，便會很仰慕那些角色，希望自己將來也做消防員。而另一邊廂，可能是某些傳媒工作者透過不正當的手法製造新聞，或誣蔑別人等。剛巧統計調查是在那個時段做的，就會出現有這樣的結果。所以大家都要保持適當的敏感度，因為當時社會氣氛和環境，有機會影響統計調查所得到的結果。

黃德如：謝謝盧女士。希望在座各位同學日後看民意調查時能自我反省一下，為什麼工聯會調查出來的失業率和政府的數據相差這樣遠呢？請問其他講者還有什麼補充嗎？

鍾庭耀博士：我想補充一下剛才提到的所謂變數。變數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訪完」的變數，即訪問完後，又「呢秤」，又「作數」等問題。這是質量控制的問題。剛才已提過需要很多核實及翻查，這個問題要用品質控制（quality control）去處理。第二種是被訪者的變數，即「對象」的變數。剛才已討論過有可能無論花多少努力，最後也不能把整個調查完成，但原則只得一個，就是盡可能將調查完成，即使用很多方法去尋找資料。但當你真是找不到或不相信這些資料的時候，便唯有作廢。作廢的問卷當然會在回應率上反映出來，同時在調查報告上，應如實記錄和描述曾經遇到的問題，以及有多少個問題個案。

第三種變數可能是「工具」，即是否因為問卷本身設計得不好，令調

查根本無效，或到做訪問時才發覺有問題。我相信解決這種問題只有一個可行的方法，就是盡量先做一個試查，即是在預先做一個大型研究之前，問卷草擬好之後，先試做起碼廿個個案，看看在一個模擬真實個案的情況下，會不會出現問題。如試查結果都發覺有問題，應重申檢定應否作修改。這三個不同的變數需要不同的處理方法，內裏的學問可說是十分多。

黃德如：謝謝鍾庭耀博士。呂大樂博士也有補充。

呂大樂博士：我其實想鼓勵一下同學。第一，你不要當參加這聚會是習作。做調查是一個花時間、花功夫的過程，所以如果你隨便選擇不感興趣的題目，去到將近完成的時候，你會感到很痛苦，尤其是要做過百份關於一個你完全不好奇、不想知道答案的題目的問卷。所以訂定題目也是一種生活經驗，甚至是你自己出去接觸同學或社會的一個過程。你應該嘗試找一個你有興趣之素材。第二是在想題目的時候，當然是要找一些有興趣的東西出來，但千萬不要想一些不設實際的東西。有時說出來很荒謬，但我可告訴大家，我有幾個學生試過去信和問關於人們對於賣翻版碟的態度。他做完後我覺得他是否想自殺，為什麼你不選擇去佐敦（連鼓油碟都有得賣）的地方問？這簡直是自殺式的行為。所以這些是完全不設實際及在不適當場合所想出來的方法。可能你要想一些有趣而你又想知道的。

另一組有很有趣的發現是，原來大部分同學都有用翻版碟，但心愛歌星的唱片，就買正版碟。這個有趣的發現其實很值得深究，去了解其實這些消費者與他們選購的消費品有怎樣的感情。究意是什麼因素引致他決定儲存翻版碟還是正版碟？所以就算是「八卦」題目也不打緊，但你始終要用一個嚴謹的態度去對待它。我曾經看過一些日本市場調查公司所做的報告，這些調查絕對「八卦」，例如他會問一般青年人怎樣佈置房間，放何人的海報，諸如此類。但他所用的方法及分析很嚴謹，結果報告出來成為大家都好有興趣想知道、想去看的东西。所以假若大家能夠做一個能令你校內同學都覺得有趣而閱爭相閱讀的民意調查，我相信這便是一個成功之計劃。多謝各位！

黃德如：不知在場同學還有沒有問題？

同學：我有個建議。你們說坊間的民意調查不夠專業，為什麼專業民調機構又不曾利用傳媒來解釋坊間民調的謬說給市民聽呢？

鍾庭耀博士：許多時候我根本沒有親身解說的機會。你有一個很嚴謹認真的研究報告，但去到傳媒或記者手上，再給報紙編輯看過後，覺得可以當一個故事處理，就只用一小角位置刊登。在這個過程中，他必然用有意思和吸引讀者的角度去選擇刊登。當日後刊登出來後，你會大發雷霆，很高興，那怎麼辦呢？難道你召開記者會大罵那份報章一頓嗎？原先我覺得可以行得通，後來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因為話題在一天後已不存在，明天是另外一個話題。所以我認為要徹底改善這種工作，當然是從最長遠的教育



工作做起，因為如能改變讀者的要求，情況便可能會有所不同了；如果我們的讀者群能夠支持一份，甚至兩張有份量的報紙，可能現在社會的心態已改變了。可惜現在連一張也沒有。

從另一角度來說，不論是傳媒還是作研究的專業，我始終覺得香港業界非常缺乏一份專業守則，因為在外國，這些守則比比皆是，有國際性的守則，也有不同國家的守則，有些更是共通的。盧女士較早前說過，發表調查的基本條件是傳媒在報導（carry）調查時，起碼要講出最基本的數據，那麼你便可自行判斷。這其實只需要少少功夫便可，不難做到，但現在似乎連這一步都很難做到。要由零去到一，第一步可怎樣做呢？其實我想得比較灰，但當然都要去做，要不然也沒有今天這類活動。我想在傳媒方面做多些功夫，學術界也要多些批評的聲音，像狄志遠先生的聲音。多些出來批評，起碼能喚醒業界和大眾，有時可能要一個高品質的調查研究，尤其是高品質的報導調查，這樣可促使做調查的機構格外小心，因為狗屁不通原來是不獲媒介報導的，這樣便開始有些改變。總而言之，我們現在並沒有一個空間為自己做出來的調查自辯。

黃德如：我想補充一下，其實不是所有傳媒的質素都這麼差。以我的經驗來說，我沒有做過報紙，但很多所謂的民意調查發佈會，我以前做的電視台都不會去；就算發佈會在星期六、日舉行，我們也用不去和不報導的方式，讓它不了了之。此外，我認為不應該只針對傳媒，以我的經驗和體會來說，現在大學在決定是否做某些民意調查時，已會考慮一個元素，就是這個民意調查會不會吸引到電視台、報紙及電台來採訪。你們已經考慮這個因素，甚至可以說，有部分民意調查，正被會不會被報導這個因素牽著鼻子走。所以他們訂題目時，甚至是發新聞稿時，會選用一些非常吸引傳媒的題材，譬如青少年、老年人、或某年的自殺率。我覺得這種關係是互動的，不可以只罵傳媒。我希望你們這些後起之秀能用你們雪亮的眼睛，以批判的眼光來看民意調查是什麼一回事，亦希望你們的報告（project）能做得好。